

# 王羲之《尚想黄绮帖》在西域流传

荣新江

(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)

2010年，笔者曾撰《〈兰亭序〉在西域》，提交10月16—17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办的“冯其庸先生从教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”<sup>1</sup>。事实上，王羲之书法的西渐不仅仅透过《兰亭序》，还有现在没有原样摹本流传的《尚想黄绮帖》。

敦煌文书中保存有若干王羲之《尚想黄绮帖》（即《自书论》）的抄本，其中英藏S.214、S.3287号由池田温先生检出，并在大文《敦煌写本所见王羲之论书》中有所解说<sup>2</sup>。今参照池田先生的文章和有关同卷其他内容的敦煌学研究成果，将此两卷介绍如下：

S.3287正面是《吐蕃子年五月左二将百姓汜履倩等户口状》，计五件，前后残，最后有杂写文字，是《尚想黄绮帖》首行（图1）<sup>3</sup>。关于子年的年份，池田温先生推测在9世纪前半。杨际平先生有专文讨论，以为是公元820年的庚子<sup>4</sup>。写本的另一面依次抄有《千字文》、《尚想黄绮帖》、《十五愿礼佛》、《甲子五行歌诀》、《早出缠》、《乐入山》、《乐住山》、《李涉法师劝善文》等<sup>5</sup>。按照敦煌文书的一般情形，《子年户口状》应当是正式的文书，是先写的正面；《千字文》等抄本，是利用废弃文书而抄写的蒙书、字帖、通俗文学作品等，这些应当是后写的，即写本的背面。敦煌从786年至848年为吐蕃统治时期，《尚想黄绮帖》等文本的抄写年代更有可能是848年以后的晚唐、五代归义军时期。

S.214正面抄《燕子赋》，尾题有二，一曰“癸未年十二月廿一日永安寺学士郎杜友遂书记之耳”，一曰“甲申年三月廿三日永安寺学郎杜友遂书记之耳”<sup>6</sup>，学者考证两个时间均在公元924年<sup>7</sup>。该卷背面为杂写、杂抄文字，首行有“甲申年十月廿日”云云，次行即抄《尚想黄绮帖》，墨色较前后为重，以下有行人转帖、社司转帖、诗、什物历等文字的抄录，其中有“甲申年十一月廿日绿（录）事杜友遂帖”的习字<sup>8</sup>，可知都是学郎杜友遂的习字杂写，年份也在924年。

<sup>1</sup> 拙文《〈兰亭序〉在西域》由会议主办方安排，先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编《国学学刊》2011年第1期，65—71页，后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《国学的传承与创新——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，1099—1108页。

<sup>2</sup> 池田温《敦煌本に見える王羲之论书》，《中国书论大系月报》第5号，1979年，8—12页。

<sup>3</sup> 池田温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，1979年，录文246号，519—522页；《英藏敦煌文献》第5册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，34页。沃兴华《敦煌书法艺术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，54页）以及张天弓《论王羲之〈尚想黄绮帖〉及其相关问题》（《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》，河南美术出版社，2004年，36—51页；后收入氏著《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》，荣宝斋出版社，2009年，129—147页），均指P.2378为《尚想黄绮》习字，但该号实为《道经》、《五藏论一卷》（图版见《法藏敦煌文献》第1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82—84页），前人或误S.3287为P.2378。

<sup>4</sup> 杨际平《吐蕃子年左二将户状与所谓“攀三部落”》，原载《敦煌学辑刊》1986年第2期，此据作者《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文选》，台北：新文丰出版公司，2007年，281—291页。

<sup>5</sup> 《英藏敦煌文献》第5册，27—30页。参看沃兴华《敦煌书法艺术》，53—55页。

<sup>6</sup> 《英藏敦煌文献》第1册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，84—86页；黄征、张涌泉《敦煌变文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，376—380页；郝春文《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》第1卷，科学出版社，2001年，315—320页。

<sup>7</sup> Lionel Giles, *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*, London, 1957, p. 236; 李正宇《敦煌学郎题记辑注》，《敦煌学辑刊》1987年第1期，35页。

<sup>8</sup> 《英藏敦煌文献》第1册，86—87页；郝春文《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》第1卷，330—338页。

法藏 P.2671 正面是《大乘无量寿宗要经》，背面是白画《未生怨》、《十六观》，画稿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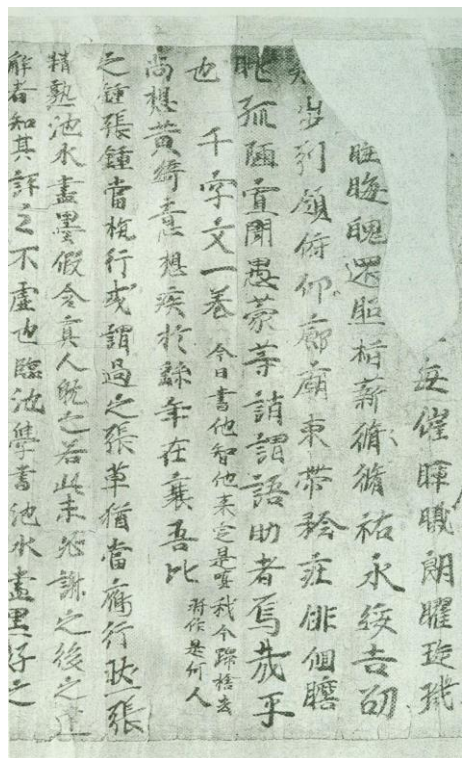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敦煌写本 S.3287《尚想黄绮帖》习字

有一些杂写，其一写“尚想黄”三字各一行，方向是由左向右书写<sup>9</sup>，其为《尚想黄绮帖》开头三字的习字。

P.3368 是《新集文词九经抄》写本，从上面揭出若干残纸片，其中第7片上写“池水”三行，“池”字写一行半<sup>10</sup>，这也是《尚想黄绮帖》帖文的单字练习。

此外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BD9089（陶 10）背，有“尚想黄绮意想□□”等字迹，俄藏 Дх.00953 背面有“尚想黄”三字，均为《尚想黄绮帖》习字本<sup>11</sup>。

除此之外，近年发表的日本杏雨书屋藏羽 3 背面第 2 篇文献，也是《尚想黄绮帖》的抄本（图 2）。按，羽 3 号写本是羽田亨从中国购藏的原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，正面是《十戒经》写本，楷书精写，有至德二载（757）五月十四日吴紫阳题记。写本上有李盛铎家藏书印，首钤“两晋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轩”，尾钤“李滂”、“敦煌石室秘籍”、“李盛铎合家眷属供养”印。背面抄佛典《辨中边论》卷一，后有余白，倒书《尚想黄绮帖》三行半，未完而止，是习书一类文字<sup>12</sup>。此抄本文字颇佳，有王书精神，可能临自正规的帖本，因此得以保存。

<sup>9</sup> 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献》第 17 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，179 页。参看沃兴华《敦煌书法艺术》，54 页。

<sup>10</sup> 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献》第 23 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，360 页。参看沃兴华《敦煌书法艺术》，54 页。

<sup>11</sup> 参看蔡渊迪《敦煌经典书法及相关习字研究》，浙江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论文，2010 年，42 页。

<sup>12</sup> 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编《敦煌秘笈》影片册一，非买品，2009 年，39 页；《第 54 回杏雨书屋特别展示会“敦煌の典籍と古文書”》图录，大阪：杏雨书屋，2010 年 4 月，27 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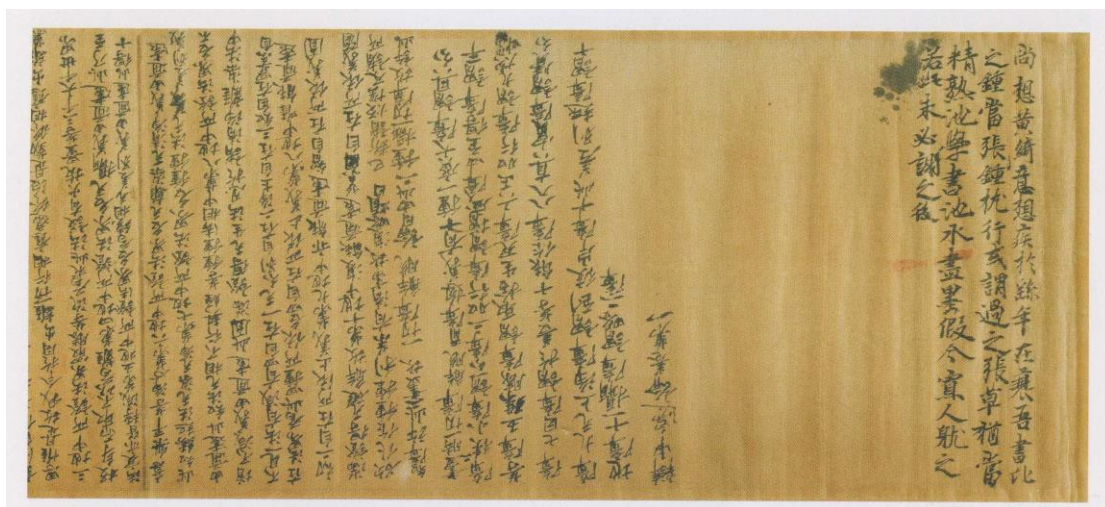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羽3背敦煌本《尚想黄绮帖》抄本

2010年4月19—24日，日本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举办“第54回杏雨书屋特别展示会”，陈列有已故著名学者羽田亨旧藏的敦煌文书羽664号<sup>13</sup>。这是一件学生习字残片，正面为王羲之《尚想黄绮帖》的文字，背面则是《兰亭序》的文字（图3a-b）<sup>14</sup>。正背形式相同，都是在纸的上端由老师紧顶着纸边横写原文，每个字写两遍，作为标本，字体较为粗大；下面整行则是学生照着标本的临写，真切地反映了敦煌学生临习王羲之字帖的样子。其中《兰亭序》部分存“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”和“湍映带左”，中间似有纸缝，故文字不够连续<sup>15</sup>。



图3a 羽664正面敦煌本《尚想黄绮帖》习字

<sup>13</sup> 羽664号著录于羽田亨编《敦煌秘籍目录·新增目录》（敦煌写本433—670番），系与其他14种敦煌写本一道，于1941年5月购自某氏。见落合俊典《敦煌秘笈目录（第433号至670号）略考》，《敦煌吐鲁番研究》第7卷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175页；参看同氏《敦煌秘笈——幻のシルクロード写本を探して》，《华顶短期大学学报》第6号，2002年，15—19页。

<sup>14</sup> 见《第54回杏雨书屋特别展示会“敦煌の典籍と古文書”》图录，27—28页。

<sup>15</sup> 参看本文注1所引拙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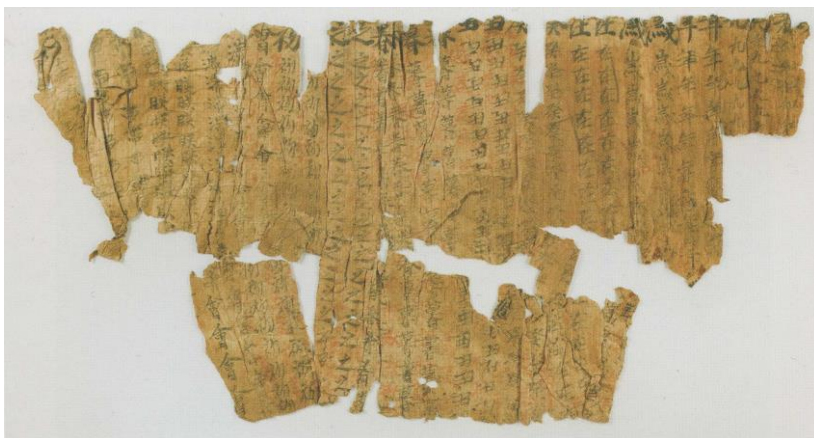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b 羽 664 背面敦煌本《兰亭序》习字

以上是我们迄今所知敦煌写本中保存的《尚想黄绮帖》抄本的情况。正像王羲之《兰亭序》的帖本一样，《尚想黄绮帖》也随着唐朝文化的西进，传入到西域地区。

首先是唐朝贞观十四年（640）灭高昌王国所建立的西州地区，作为唐朝的正州，这里的文化教育与内地应当一致，王羲之书法的流传应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我们目前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尚未见到《兰亭序》的摹本或习字，却找到两种《尚想黄绮》的习字写本。

1972年发掘的吐鲁番阿斯塔纳第179号墓，出土有若干学生习字残片，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的编者只录出其中的两件，题为“武周学生令狐慈敏习字”，并做解题云：“本件共十三片，均为学童习字，内九片为学生令狐慈敏习字，其他四片为学生和闾利习字，所写诸字不连贯，今只录一、二两片令狐慈敏题记。”其他习字残片，全部影印出来，均题“文书残片”<sup>16</sup>。福田哲之氏发现72TAM179:18编号下的各残片，都是令狐慈敏所写的王羲之《尚想黄绮帖》的文字，计写“……当抗行，或谓过之，张草……若此，未必谢，临学后之……”（图4），每字写两行。另外和闾利的习字，写的是《千字文》（均为72TAM179:17编号）<sup>17</sup>。在“未”、“过”二字间，有题记“三月十七日令狐慈敏放书”，后别笔大字“记忆”二字<sup>18</sup>，当是教师的批注。又有一纸，仅存题记“三月十九日[学]生令[狐慈敏]（下缺）”，“月”、“日”二字为武周新字，说明写在武周时期。

这个写本在王羲之《尚想黄绮帖》的传播史上非常重要，一是这件写本有武周新字，较我们所见敦煌本要早很多；二是这件写本的题记表明，《尚想黄绮帖》是当时学生必须书写的作业，每字写两行，题记后的别笔大字应当是老师的批语。可见，至少从武周时期（可能要提前到喜欢王字的唐太宗时期）开始，《尚想黄绮帖》就成为天下各州学生的习字标本，每字两行的规矩也可以从敦煌写本羽664号等得到印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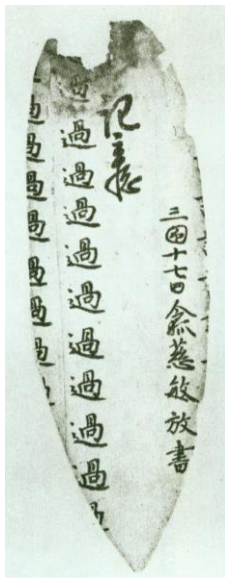
<sup>16</sup> 唐长孺主编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叁，文物出版社，1996年，363、366页。

<sup>17</sup> 福田哲之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に見られる王羲之习书——阿斯塔那一七九号墓文书<72TAM179:18>を中心に》，《书学书道史研究》第8号，1998年，29—41页。参看张娜丽《西域出土文书の基础的研究》，汲古书院，2006年，312—315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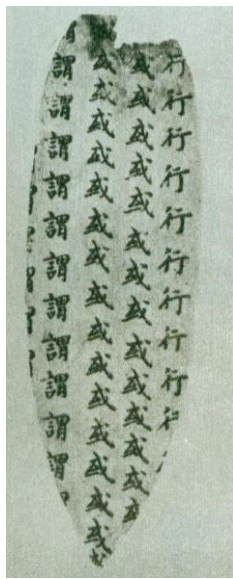
<sup>18</sup> 按此“忆”字为变体的写法，承南京艺术学院薛龙春教授、中央美术学院刘涛教授帮助释读，谨此致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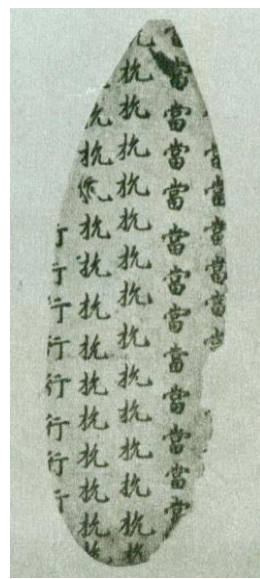
(4)



(3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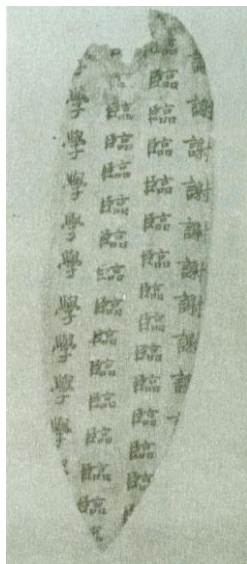
(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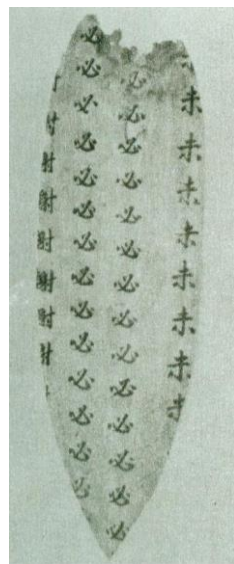
(1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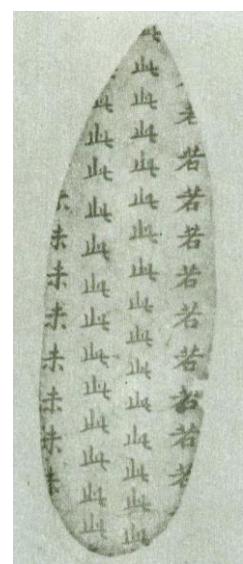
(8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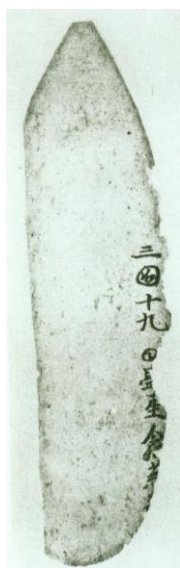
(7)



(6)



(5)



(9)

图4 吐鲁番出土学生令狐慈敏习字《尚想黄绮帖》

吐鲁番写本中还有一件《尚想黄绮帖》的抄本，即大谷文书 4087 号，其前三行抄《尚想黄绮帖》，后五行抄《兔园策府》<sup>19</sup>。此本文字不佳，系学生抄本。其与童蒙读物合抄，也说明出自学童之手。

吐鲁番所在的唐朝西州，是唐朝的正州，王羲之的《尚想黄绮帖》的流传并没有以此为终点，而是像《兰亭序》一样，继续西进，先是传到安西都护府所在的龟兹。大谷探险队在都勒都尔·阿护尔（Douldour-aqour）发现的一个小纸片（图 5），只有 3 行 10 个字，字较一般文书字体要大，有一指宽的样子，残片下为纸缝，故第 3 行末字写的较小<sup>20</sup>。前两行写“雁”，后一行写“行”，即王羲之《尚想黄绮帖》中“张草犹当雁行”的习字。文字写到纸边，也是习字的格式。虽然只是极小的断片，但证明了王羲之《尚想黄绮帖》的流传已经超出唐朝的正州，进入真正的西域地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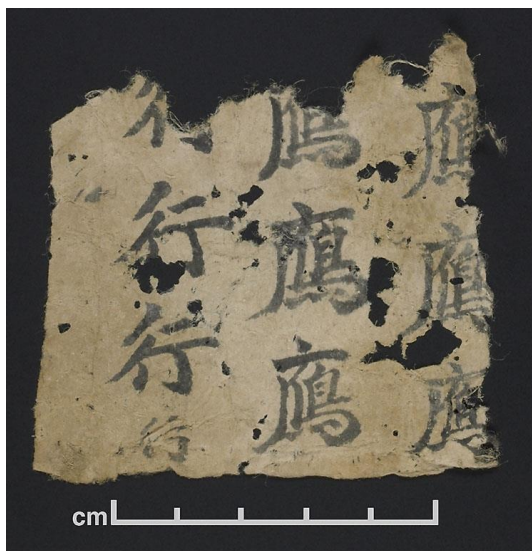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5 龟兹地区的《尚想黄绮帖》习字

王羲之书的故事还没有终止，《尚想黄绮帖》像《兰亭序》一样，还进而到达最远的西域腹地——于阗。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发现三件相关的写本。

一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在和田北方麻札塔格遗址发现的 M.T. 095 号(Or.8212/1519)残纸，残存九行文字，重复写“耽之若”三字（图 6）<sup>21</sup>，一看便知是《尚想黄绮帖》的习书文字。虽然出自一个学童之手，书法不佳，但因为发现在遥远的西域地区，在王羲之书帖的传播史上，确是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。

<sup>19</sup> 福田哲之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に見られる王羲之の习书》，33—34 页；张娜丽《西域出土文书の基础的研究》，310—312、315—318 页。

<sup>20</sup> 小田义久编《大谷文书集成》壹，法藏馆，1984 年，73 页，题“习字纸断片”，图版 132。

<sup>21</sup> 沙知、吴芳思编《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（非佛经部分）》第 2 册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5 年，197 页，题“习字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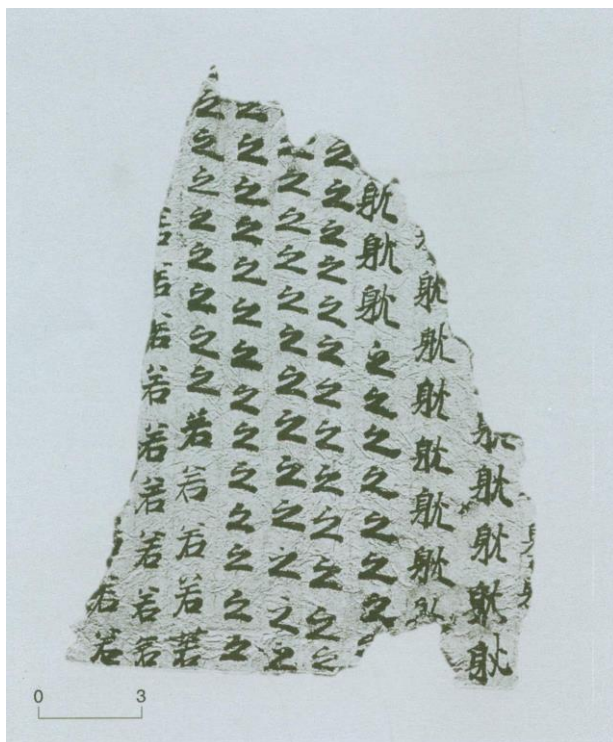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于阗《尚想黄绮帖》习字

二是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五件残片，均为“吾弗及”三字的习书，应当是三行换一字，据 S.214 写本保存的文字，当是《尚想黄绮帖》最后三字的练习。纸片虽残，但确实书圣王羲之帖文的习字，极为可贵。

更有进者，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在和田麻札塔格遗址发现残纸中，有一件（MT. b. 006 号）正面残存《兰亭序》习字“欣”字 1 行和“俛”字 2 行（“向之所欣，俛（俯）仰之间”一句的残字），背面残存《尚想黄绮帖》习字“当”字 2 行和“抗”字 4 行（对应“吾比之张、钟当抗行”一句残文）<sup>22</sup>。这个写本显然是正面抄写《兰亭序》习字、背面抄写《尚想黄绮帖》的学生习字文书，和上述羽田亨旧藏的敦煌文书羽 664 号一样，正背面都写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和《尚想黄绮帖》，这恐怕不是巧合，而是唐朝书法教育制度的体现。

我们知道，长寿元年（692）十月，唐朝复置安西四镇，并发三万汉军驻守西域。此后必定有不少通文墨的中原官人进入西域地区，中原的传统文化也随之大量流入安西四镇地区。随军的儿童也要学习书法，《尚想黄绮帖》的习字更可能出自学童手笔。吐鲁番、库车、和田出土抄本、习书《兰亭序》、《尚想黄绮帖》的发现，说明唐内府藏右军书目所著录的这些法帖，不仅仅为皇家所欣赏，同时也流入民间，传播广远，成为敦煌、西域地区学童模仿的对象，也是中原文化西渐的表征。

（2011 年 10 月 7 日初稿，提交故宫博物院举办的“2011 年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，2012

<sup>22</sup> É. Chavannes. *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*, Oxford 1913, p. 204, pl. XXXII. 正面比定见陈丽芳《唐代于阗的童蒙教育——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习字为中心》，《西域研究》2014 年第 1 期，41 页；背面比定承北京大学研究生包晓悦见告，谨此致谢。

年 3 月 31 日修订，2015 年 2 月 10 日增订。)